

洞察變局，探求未來

——寫在《澳門研究》100期出版之際

吳志良

《澳門研究》自1988年創刊、1993年復刊，自復刊至今整整出版了100期。從創刊到復刊、從半年刊、雙月刊到季刊，多番改版，逐漸成形。這100期雜誌是澳門當代學術成長的印記，也見證了澳門過去33年的巨大變化，真實記錄了澳門社會在此一翻天覆地深刻變化中的心路歷程。回顧和檢視這一過程，不僅有助於澳門學術邁上新的台階，也有助於澳門在百年不遇之大變局中認準方向、確定目標、明晰定位、開闢新途，使澳門能夠在國家發展戰略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中扮演更加積極的角色，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從而在增加自身內在價值與擴大生存空間的同時，釋放潛能、展現優勢、輻射活力、貢獻智慧。

一

《澳門研究》是在澳門回歸祖國進入過渡期之時創刊的。創刊前一年，《中葡聯合聲明》簽訂，東亞大學澳門研究所也應運而生。正如時任東亞大學校長、澳門研究所所長林達光教授在《發刊詞》中所言，《澳門研究》作為研究所的學術刊物，宗旨是一致的：“立足澳門，研究澳門社會，為澳門的安定、繁榮和發展服務。”他認為，“結束舊秩序、產生新秩序”是“一個史無前例的轉折過程，其複雜性不應低估”。因此，“深入研究澳門的過去和今天”，“對未來發展提供科學性的預測”，“搞清這過渡的內容和規律是個迫切的任務”，呼籲學者主動擔當，並引起公眾的關懷和參與。他還強調，“雖然探索的焦點應集中在澳門本身，但如果我們把它看成是一個狹隘的、孤立的問題，那麼研究的成果將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認為，澳門研究應該放在中國、亞洲和世界的廣泛關係網絡中進行，因為“這些錯綜複雜的關係構成澳門經濟、文化、學術發展的生命網絡”。也只有探索並理解這些關係的實質，我們才“有條件去找新的創造性的途徑，來開拓澳門在世界的地位並發揮其作用”。^①

1993年，澳門進入回歸祖國的後過渡期。這一年，將僅出版了創刊號就停刊的《澳門研究》復刊。我們十分認同林達光教授的遠見卓識，在《復刊詞》重申了前述的宗旨，只是在“來開拓澳門在世界的地位並發揮其作用”這句話中加上了“中國”兩字。今天誠懇重溫辦刊的初心，對澳門學術發展的方向和更好地理解澳門，仍具極大的參考價值。^②回歸

^①《發刊詞》，《澳門研究》（澳門）1988年創刊號。

^②《復刊詞》，《澳門研究》（澳門）1993年總第1期。

10年後，我們在“《澳門研究》改版寄語”中也承認，“澳門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以及社會發展趨勢，仍有待學界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如何適應時代的發展、繼續為澳門的可持續發展出謀獻策，貢獻智慧，是澳門學術界面臨的新課題”。^①換言之，雖然學術增量已經奠定了澳門研究的良好發展基礎，有條件去加強學術規範、提高研究水平和論文質量，但《澳門研究》的歷史任務尚未完成，新的學術使命已經擺在眼前。推而廣之，學術界如是，社會、政府也如是。

二

澳門開埠，是早期全球化的結晶。正如本刊創辦者所言，澳門的生命網絡建立在澳門與祖國、澳門與世界的廣泛關係上。歷史也證明，澳門的命運與國家休戚與共，其生存發展與國勢興衰息息相關。澳門經濟史研究成果表明，澳門是一個極度外向型的經濟體，甚至有學者稱之為隨波逐流式的發展模式。從早期的航海貿易到後來的苦力貿易、鴉片貿易、博彩業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的出口加工業再到現在的博彩旅遊業，都極其依賴國家與世界的發展走向，對外依存度極高。正是基於此一判斷，我們在澳門回歸祖國的過渡期就提出，澳門未來最大的挑戰是其自治能力的局限性，如何創造更好的自治條件，增強自治能力，忠實、有力地實踐“一國兩制”，建設好特別行政區並保持長治久安，是包括學者在內每一個澳門人必須思考的問題。

中國40多年前開始的改革開放，帶動了當代澳門經濟的起飛，為澳門回歸祖國奠定了初步的經濟基礎。過去20多年來，澳門順利完成了從“葡管中國領土”到建立“澳人治澳”的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變遷，特區開局良好；特區成立後，博彩業適度開放，一定程度上推行了經濟制度的變遷，改變了主要行業獨家經營的狀況。政治與經濟的兩次制度變遷，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區政府和居民的共同努力下，都非常順暢並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功：經濟快速增長、居民收入明顯提高、民生福利大幅改善、社會和諧穩定、民主政治穩步發展，一改回歸前治安不靖、經濟蕭條、民生艱難的困境，呈現出一片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局面。與1999年相比，2019年的本地生產總值增加8倍多，人均生產總值增加5.5倍，居民收入中位數增加了約4倍，政府財政收入增加了約8倍，實行15年免費基礎教育，學生和65歲以上人士享受免費醫療，社會房屋和經濟房屋供應不斷增加，社會保障基本實現居民全覆蓋。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巨大的變革中，單一的經濟結構和鄉土型社會形態卻沒有太大的改變。

在歷史性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的過程中，中央政府多次提醒澳門要居安思危，特別要加速推進經濟適度多元化，解決“一業獨大”、過度依賴博彩業的問題。中共十九大提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戰略，中央2019年正式頒佈《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為港澳

^①《復刊詞》，《澳門研究》（澳門）2010年第1期總第56期。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乘上祖國發展快車搭建了平台。2021年9月，中央印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總體方案》，澳門正式參與橫琴的“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深合區成為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的新平台、便利澳門居民生活就業的新空間、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新示範、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新高地。

橫琴深度合作區是在配合國家“十四·五”發展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背景下成立的。粵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橫琴深合區，是“一國兩制”實踐的重大突破，是澳門邁向新征程、增加新動能、創造新氣象的重大歷史機遇，是澳門政治、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甚至比20年前博彩業適度開放，更能對澳門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三

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澳門經濟起飛為第一次現代化，那麼，博彩經營權適度開放以來的經濟飛躍則為第二次現代化，而橫琴深合區建設有可能將澳門推向第三次現代化的進程。第一次現代化主要是原始資本積累，第二次現代化為澳門帶來富足，我們期待，第三次現代化促進澳門社會的整體進步。在第一階段，人心思歸，絕大多數澳門居民盼望早日回到祖國的懷抱，當家作主。當然也有極少數人對澳門發展的信心不足，移民他鄉；第二階段，人們在發展和分享之間、保育與發展之間產生了激烈的討論和爭議，要求公平正義，反對資本擴張對城市景觀、特別是受保護文物和澳門寧靜的生活造成過度的影響。從2007年“五一遊行”到2014年“反離補運動”和2016年“資助暨南大學事件”引起的遊行，從保護燈塔運動、火葬場選址到旅遊稅的討論，清晰反映了澳門社會、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心路歷程和情緒訴求。在歷次社會運動中，民粹主義、福利主義此起彼落，甚至出現了越來越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排外情緒，本土觀念、本位主義在這些思潮的影響下得到放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原有社會資本的流失。

可以說，第二次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與矛盾，既是第三次現代化要面對和解決的，而某些負面思潮又將影響第三次現代化的順利展開，值得高度重視。歷史上，澳門一直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天南海北的移民來澳門定居發展，同舟共濟，守望相助，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在澳門可以和睦相處，共生共榮，塑造了“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核心價值，這是澳門彈丸之地賴以生存的根本。歷史已經證明，封閉導致短視、帶來衰敗，開放開拓眼界、促進繁榮。新冠疫情的無情衝擊，促使我們更加冷靜地梳理澳門走過的路，理性地思考澳門未來發展前景，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迎難而上，砥礪前行。可幸的是，回歸祖國20多年來，澳門人的家國情懷顯著增強，社會的政治基礎更加牢固，為第三次現代化創造了有利條件。

正是國際格局的巨變、中國的快速崛起和“一國兩制”在澳門的成功實踐，造就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成立。無疑，深合區將再次激活澳門的“生命

網絡”，改變澳門一向被動發展的邏輯，是澳門發展的歷史性轉折。能否抓住機遇、主動掌握命運，還要看我們能否解放思想、突破思維局限，充份認識到此一重大舉措的意義並在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創新，在一個更大的格局中思考發展的問題，在一個更大的空間裡解決發展的矛盾，在一個更高的平台上尋求突破發展的瓶頸。在橫琴深合區，兩種制度可以各顯優勢，又可以互補短板，還會倒逼澳門內部的制度改革。

在新的歷史階段，澳門發展的方向、目標和定位逐漸明晰：首先，正確認識和實踐“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以及國家的憲制權力和憲制機關的權威；其次，落實“愛國者治澳”，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和體系，理順政府的職能，建立高效的行政架構和隊伍，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第三，全情投入橫琴深合區建設，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貢獻力量並分享紅利和榮光；第四，促進澳門經濟多元化，加快“一平台、一中心和一基地”建設，優化澳門居民的生活工作空間和條件，提高居民的民生福祉和幸福感，逐步解決社會發展積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

港珠澳大橋計劃從“單Y”變為“雙Y”，給本位主義提了個醒；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計劃橫空出世，又為我們樹立了一個好榜樣。我們相信，只要時刻保持開放的心態和合作的精神，不斷提升競爭力和管理水平，主動、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一個更高的格局、更大的空間裡，澳門社會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將得以逐步解決，第三次現代化將為澳門帶來一個全新的局面，“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必將邁上新台階。

澳門學術界一向具有現實關懷，澳門學術也有實用主義的傳統，洞察世局變化，緊貼時代發展步伐，圍繞澳門發展的中心，展開學術研究，探索特區發展道路，提出解決發展中問題的方案，為建設更加繁榮、富強、和諧、文明的新澳門獻計獻策。澳門研究以澳門為主題，不可避免有澳門情結、澳門視角、本土意識，但一定要避免自我中心、自我膨脹、自以為是，更要警惕民粹主義、本土優先、不願也不敢競爭等思潮的侵擾，保持開放、寬容的精神，樹立正確的是非觀與價值導向，科學理性地探討問題，引領和促進澳門學術和澳門社會的健康成長。

感謝三分之一世紀以來各位作者、歷任主編和編輯部同事的奉獻，使得《澳門研究》能夠發展至今並不斷擴大在學術界的影響力和知名度。我們相信，《澳門研究》作為學者拓展澳門研究、砥礪學術人生、創造增量知識、提升研究水平的學術平台，必將一如既往服務澳門研究，服務澳門學者與廣大讀者，努力做促進澳門發展、深合區與大灣區開發、國家現代化建設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助力劑與推進器。